

## 安德恩·甘迺迪(Adrienne Kennedy):《黑人瘋院》

輔仁大學英文系 劉雪珍 撰

身為少數有所成就的女性黑人劇作家之一，安德恩·甘迺迪(Adrienne Kennedy)對於女性恐懼之描繪，顛覆了根深於異性論述中一直佔據優勢的性別、種族與階級意識形態。甘迺迪早期的劇作著重於片段、破碎的女性角色性格。

目前甘迺迪十四本劇作中，大多數的作品已做正式的演出並且出版。從自身的夢與記憶以及神話與歷史背景中之汲取意象與人物，甘迺迪為觀看者呈現出自己對於人類經驗，尤其是美國經驗的印象派式絕妙洞見。通過異性性交，劇作中之人物將家庭、文化與過去和未來的世代連結起來。進入異性戀的世界，不只意味著個體通過身體與社會的儀式，也同時踏入終究是虛構與剝權的歷史中。

《黑人瘋院》(*Funnyhouse of a Negro*)、《梟言》(*The Owl Answers*)、《老鼠彌撒》(*A Rat's Mass*)、《死亡語言之啟示》(*A Lesson in Dead Language*)等一系列擾人不安、沒有出路、非死即瘋的劇作中，女性人物皆害怕恐懼(異性)性交造成的肉體侵犯，特別是強暴的獸行。加入異性這個體系，不只意味著一項獨立個體身體與社會的儀式，也是進入一種終究是虛構與剝權的歷史。這是因為北美以歐洲為中心的種族主義父系社會，向來否認、歪曲並打壓非裔美籍女性了解、讚揚自己歷史的意圖。如果這些非裔美籍女性成功地將自己與自己的世系連結起來，就證明她們也是人類的一部份。為了維持既得利益與優勢，北美以歐洲為中心的種族主義父系社會當然拒絕承認她們自己的道德機制。

安德恩·瑞奇(Adrienne Rich)認為每位女性皆有以身體政治、開始在歷史找尋自我定位之必要，此即所謂的「地域政治」。而甘迺迪之劇作恰為瑞奇「地域政治」的具體呈現。在挫敗的人物與無止境遲緩的敘述之外，女性主義讀者仍對其寫作藝術中的政治正確性著迷不已。甘迺迪劇作所描繪的不只是性別問題，還建構出融合了種族與階級的複雜母型。研究甘迺迪的劇作，其文本與內容意象(包括多重的自我、怪誕的生物、奇形怪狀與俗世景況等)引導本人進入歷史、仔細檢視特定文化場景中的歷史變數。以此方法，甘迺迪之作品生動地呈現了瑞奇(Adrienne Rich)的「地域政治」觀念。自由運動不斷推進浪潮已經分裂成各派系並且形成聯盟。甘迺迪的劇作持續地困擾著觀看者心神，迫使他們正視美國歷史文化這套複雜的體系以及每一位美國人背負著不公不義遺產的事實。

為了闡述甘迺迪劇中人物缺乏或無力建構道德機制的情形，賀格藍(Sarah Hoagland)對於異性戀的概念，認為異性戀「是一種生活方式...將人在互動中分別成為主導與附屬關係的情形合理化」，並且損害了女性機制。賀格藍進一步說明異性戀這樣的體系如何讓殖民看來自然又正常。事實上，運用羅德尼(Walter Rodney)的想法，賀格藍認為黑人女性身體在甘迺迪的劇作中成為歐洲帝國主義殖民者重演非洲殖民的地域。賀格藍的理論說明，以歐洲為中心的藝術與文學普遍使用以處女地或未開發地象徵代表女性身體的轉喻。

## 《黑人瘋院》(Funnyhouse of a Negro)

《黑人瘋院》1964年1月4日於東區戲院(East End Theatre)上演後立即引起極大正反面的迴響。評論家陶曼(Howard Taubman)認為此劇刻劃「黑人女孩臨終前所遭受的幻想折磨」,且本劇作者甘迺迪「毫不留情地挖掘莎拉創痛的心靈。」(25頁)奧利佛(Edith Oliver)則認為莎拉對頭髮的妄想,象徵著「她對父親揮之不去的悲痛及內疚,因為她曾排斥父親的黑人血統。」(79頁)然而貝靈頓(Michael Billington)卻認為本劇劇情千變萬化,容易引起觀眾的困擾(13頁)。奧茲海默(George Oppenheimer)認為此劇荒謬至極,不按一般劇情發展,毫無劇情可言,只是一齣「非劇目」劇(non-play)。克拉曼(Harold Clurman)對本劇則讚佩不已,認為劇中黑人女孩莎拉的悲痛象徵著所有少數民族與被殖民者遭受的相同痛苦。《黑人瘋院》揭櫫的意識型態已遠超越種族的藩籬(154頁)。

《黑人瘋院》於1964年由Michael Kahn擔任導演上演,且榮獲奧比(Obie Award)獎之肯定。因其反寫實、超現實及劇情曲折千變萬化之獨特手法,本劇實屬反寫實「非直線性發展」戲劇創作之典範。劇中以拼貼方式所呈現出的意象、文本、見解及故事片斷,隱隱透露出後現代主義的早期風格。

本劇之背景故事如下:黑人女子莎拉(亦即本劇標題中的「黑人」)求學期間與猶太籍男友雷蒙於曼哈頓賃屋居住,同時她對自己的血統深感困惑不已。莎拉之母雖為黑人,但膚色稍淺且擁有一頭美麗的直髮。她嫁給另一位膚色較深的黑人(亦即莎拉之父),最後卻不再愛他。莎拉的父親從小被母親扶養,在喬治亞州長大。由於母親是虔誠的信徒,她希望兒子長大後成為黑人種族的救世主,更鼓勵他到非洲旅行且於叢林中建立基督教教區。她甚至反對兒子與莎拉母親的婚姻。就在非洲旅行的當時,莎拉父母二人的感情漸行漸遠,父親竟於某天晚上,藉著酒意強暴了母親。女主角莎拉就是父親強暴母親所生下的孩子。不久,莎拉母親便開始掉髮且變得神智不清,最後在精神病院了卻殘生。莎拉母親受折磨的同時,父親的遭遇也是淒涼。他失去為宗教奉獻的使命感,返回紐約,獨自住在哈林區的旅館裡。他對妻子的發瘋深感內疚,因而日益憔悴,心神不寧。受不了女兒的恨意及背叛他母親期望的雙重煎熬,他親自拜訪女兒,希望得到她的寬恕。然而莎拉毫不領情地趕走他,傷心之餘,他走上了自殺之途。稍後,莎拉亦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因她始終拋不開對父親死亡的內疚及憤懣,她更擺脫不了來自父系,卻阻礙她在白人世界發展的黑人身份與血統。

本劇以女黑人莎拉的故事為主軸,詳述莎拉掙扎著逃避其心理夢魘的過程。全劇包含三種不同型式的呈現:舞台效果,傳統的角色對話,以及法國批評家所謂的純粹書寫"écriture"(亦即以獨白方式產生的文本)。此三種型式隨劇情的鋪展不停互換,且繞著女主角莎拉的行動旋轉。《黑人瘋院》劇中種種顯著的性別、種族及政治議題,模糊了它本身的簡單架構。劇中不斷重覆出現的儀式及原始儀典故事的成份一再重覆古老且傳統的戲劇組織。除此之外,本劇明顯的師法古典佛洛伊德夢的呈現形式。啟幕時,一個拿著禿頭且身穿白睡袍的女人走過舞台,這個夢遊般的人物不僅揭開本劇之序曲更暗示著一場夢境的開始。